

卜正民
格力高利·布鲁

主编

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

汉学知识的系谱学

卜正民

主编

格力高利·布鲁

台湾“国立”编译馆主译
古伟瀛等译

中国
与历史
资本主义
汉学知识的系谱学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加)卜
正民,(加)布鲁主编;古伟瀛等译. —北京:新星出
版社,2005. 5

ISBN 7-80148-761-3

I. 中… II. ①卜…②布…③古… III. 资本主
义—研究 IV. D03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2019 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84094409

传真:010-8409478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300 1/32

印张:13 字数:336 千

版次: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3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序 言

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著

古伟瀛 译

这本书本身有它漫长且复杂的历史。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视野上观照,针对欧洲与中国两方诠释中国的过程加以处理的原创构想,系承自李约瑟,他在 1995 年以 94 岁高龄过世。李约瑟在众多严肃地以中国历史来质疑有关欧洲史及世界史的诸多预设之西方学者中表现不凡。他以自己所致力之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业绩,来肯定中国对世界的科学与知识与科学文化的贡献。他想要去理解为何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曾较为先进,但却在 16 世纪以后为欧洲的“现代”科学所比了下来,因此他要从历史上重新建立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原有的传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以消极方式呈现其问题意识,即:“为何中国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只出现在欧洲?”但他不久就扩大了他的探索方向,并以较为积极的形式提出:为何中华文明在 16 世纪以前,“获取自然界知识及将之应用于解决实际生活上人类的需要两方面都远较西方文明有效率?”中华文明在 16 世纪前的优越与欧洲文明在 16 世纪后之优越,这两者间的差别,李约瑟相信并非文明的天赋所致,正如他那一代人与其前辈所如此地认为,乃因形成两个社会的环境间的差异所致。在李约瑟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欧洲业已经历

社会、经济以及知识的转化,而中国却并未发生这些转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物质生活组织所产生的诸种因素,而此乃当今学者才开始分辨出来的问题。〔1〕

李约瑟相信:若要发展出一套令人满意的、关于中国科学历史进程的解释,则需要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方有可能。而他选定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七分册,作为这套丛书中处理这一问题的场所。李约瑟七十多岁时,开始觉得其他《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承诺将使他自己无暇完成此项工作,于是他安排第七册的其他几位协同执笔者由不同的角度探索此一议题,亦即将中国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比较,这一议题白馥兰(Francesca Bray)在她所执笔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农业部分的分册也有处理。〔2〕在1977—1978年,李约瑟安排格力高利·布鲁(Gregory Blue)与卜正民(Timothy Brook)参与第七册执笔,题目则是个别探讨欧洲与亚洲关于中国社会的解释。〔3〕李约瑟承认这两个题目对他个人的思考有很大的影响。在1983年,李约瑟邀请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检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环境,用以建立一现代人对欧洲历史发展之特色的最佳理解。由于在1990年代初编辑第七册我们执笔的部分时发生预料

〔1〕 Needham, 1969; Needham and Huang, 1974.

〔2〕 她在那里讨论北欧生产的技术情况有利于大规模、能配合大规模的经济体系的农业发展。它们更因而促进了农业上的资本主义式生产。当时的环境是劳力密集与技术导向,农业并非如此。见白馥兰,1984: 6, 134—139, 198—202.

〔3〕 我们两人先前对于西方汉学及中国正统马克思主义学对于古代及中华帝国历史的看法如此不同而十分惊讶,乃在李约瑟与我们合作之前,我们不约而同地决定将研究重点放在比较“前资本主义”发展的议题上。我们曾个别与那个时代才出版不久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极权国家下的宗族》(*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有过一些参与及互动,尤其是该书相当扎实的附录,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其中包含了对李约瑟所提出的“官僚封建主义”的深入评估(第八册的合作者黄仁宇,曾将此书提供李约瑟参考)。王国斌最早将安德森的著作引介绍卜正民,我们很高兴见到王氏能参与我们这场思想的探索之旅。

之外的困难,导致这一部分取消。我们之后怀着抱歉之意,决定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架构之外发表我们的成果。为增广这本书的视野,我们邀请王国斌与白馥兰两位参加章节执笔,这将有助于完成这本书所试图描述的知识轨迹:开始于欧洲的独特性,而终结于中国的特殊性。

我们要感谢这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对这本书各章节提出意见的以下诸位:他们是: Martin Bernal, Joshua Fogel, Dieter Kuhn, Kenneth Pomeranz, Elinor Shaffer。对于在这本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所给予支持的下列人士,我们亦致感谢之意,他们是: 剑桥东亚科技史图书馆的历任馆员们,在最后阶段中制作原稿与进行校对的 Ludgard De Decker,还有 Richard Fisher(由于他的协助,我们才有将作品交由剑桥大学出版的荣耀与愉悦)。在最后,我们想保留我们最终的感谢给彼此对方。当我们开始我们为完成现在这本书的曲折之旅时,我们并不知道完成这趟旅程所需的漫长时间,以及在途中将产生的友情关系。我们但愿李约瑟仍然在世与我们分享这份喜悦,如果他仍然在世,他必然会的。

谨识于 1998 年 12 月 9 日

目 录

序 言	1
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著	
古伟瀛 译	
导 论	1
格力高利·布鲁、卜正民 著	
古伟瀛 译	
第一章 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	11
伊曼纽尔·华勒斯坦 著	
郭慧英 译	
第二章 “中国”与近代西方社会思想	70
格力高利·布鲁 著	
宋家复 译	
第三章 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	132
卜正民 著	
李荣泰 译	
第四章 迈向批判的非西方科技史	195
白馥兰 著	
费丝言 译	

第五章 农业帝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在当代的遗迹	251
-------------------------------	-----

王国斌 著

邱澎生 译

征引书目	300
------------	-----

索引	371
----------	-----

导 论

格力高利·布鲁、卜正民 著

古伟瀛 译

1
整个世界的历史经验一直都是中国与西方的一样多。^{〔1〕} 这个单纯的事实只有在最近的西方世界才被承认,而且也仅只在某些圈子中被承认。由于从欧洲历史及社会科学经验中导出来的社会模式之占据主流多年,使得这种承认一直无法落实。往往社会科学导出来的通则——这在亚洲与西方都一体适用——奠基在以下的这个信念上:西方是作为建构一般知识的标准起点。我们所使用的范畴几乎全都是主要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等等。直到最近,中国才有时被考虑在内,然而只有在中国作为对于欧洲问题提出的欧洲解答之旁证时才显得重要。虽然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对西方的观察者而言提供了许多彰明昭著的异例,但这种附着于欧洲历史分析概念背后的意义之目的论则未受到冲击,一直未变。在这本书中我们想以不同的方式来记载中国的历史经验:在前三章中要探讨的是:西方历史知识的传承如何影响其对中国的认识;而在后两章中,我们提出如何从这种死胡同中走出的看法。

不管受到西方知识体系如何地削弱,中国至少从 13 世纪以来

〔1〕 同样,或与其他的地方一样多。

一直是欧洲人强烈思考的对象。自从马可波罗口述忽必烈汗国的繁荣以来,甚至比此更早,西方一直被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巨大实体所吸引。众所周知,想与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做生意的美梦曾经启发了许多人,尤其是哥伦布寻求前往中国的路途,而成功地引导了正在扩张中的欧洲诸国之投入资源,以支持其冒险事业。这项事业是由从玻利维亚波托西(Potosi)银矿的暴利中得到了财政支援,2 而其所得到的利润足够弥补两百年来贸易不平衡的损失。惟有在此之后,贸易平衡才决定性地有利于西方,造成此一现象的较为主要的原因,是军事力量的介入与英国鸦片的强制输入,而新兴工业化所产生的纺织品贸易,则居于较为次要的位置。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强制措施,这些措施曾在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实行过,也在日本实施了一段时间,包括:开放对外通商口岸,关税固定于低税率,赋予外国企业在商业、金融方面的特权,允许外国传教士享有居留、传教权,允许西方人(以及稍后的日本人)在(中国境内)享有治外法权,以及割让在战略上或经济上具重要性的领土。从1840到1880年代中国被迫接受这种逐渐扩张贸易体制,促成了所谓的“中国贸易”的持续增长。在这一时期,中国由于国内主要的内乱而遭受折磨,最为人所知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估计有二千万人丧失生命(大约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者总数);还有在1870年代后期发生饥荒时,又使近一千万人死亡。而20世纪初外交情势上的纠葛以及迅速飙升的外债更促使中国的国际支出平衡与国际形象严重地衰退。

由于对本国的衰弱充满着急切感,中国的知识分子努力找出为何中国社会过去并未发展出有效率的、“现代的”制度,以及能与西方、日本相称的生活水准之确实原因。这一问题于18世纪后期在西方已被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家、历史学者、经济学者、负责为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政治家们提出。而在1880年代时,这一问题则正攫取日本思想家的注意力。进入20世纪后半叶,这一问题继续在东西方成为关于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地地位的学术研究

及实际定策的基本思想基础。

为直接探讨中国积弱的问题,一种自然的解释策略是将中国视为个别单独的文明整体,然后将其与同样被视为另一个单独文明整体的西方相对照。这一策略的目的是找出在“中国”到底缺少了什么,其实中国在真实世界中,她的位置绝非处于中央,反倒显得愈来愈边缘化。这一比较策略的“正常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中国与西方都具有的强烈的排他性认同感而来。在过去关于“中国所缺的最基本的是什么?”的讨论,大部分赞同改革中国的人都会将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理所当然地归诸于中国缺乏西方社会拥有的特质或制度。与此同时也有下列的预设:正确地找出中国所缺的地方将使中国有可能借由实行适当的西方政策及制度,而改善自身的处境。如果在今日,这一思考方式让人想起萨伊德关于西方帝国主义如何造成“东方的东方化”的观点,那么在 1905 年时,从日本的事例可知,日本一方面将“自我东方化”,另一方面又广泛地“向西方学习”,两者结合,颇有助于增强国力、维护主权以及改善经济表现。

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从而加以比较的分析策略,其实背后含有好几重预设,而从这些预设中,看来可以推导出中国在本质上劣于西方的结论。第一个预设,也是最基本的预设,是相信西方文明(或至少是西方文明的要素中被人称赞的部分)拥有先天上超越其他民族(文明)的特质——无论是文化、社会、经济或是生理构造方面。另一个预设是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业已成为一种封闭的过程。结合这两个概念,支持了一种看法:即西方的历史发展经验主要是西方固有优越特质的产物,这一优越特质为西方社会所独有。因此,自从远古以来——也许始自希腊,但尤其是日耳曼民族入侵以后,西方文明既不受外来文明的影响,也不与其他文明交流。持进步观的思想家一般都认为西方的历史经验,其自体即代表世界历史进程的标准模式,而反对进步观的人则也会相

当乐意地将“进步”描绘成一个由下层阶级与“次等民族”等共享的梦。^{〔1〕} 不管其政治态度为何,19世纪的分析家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代以来实质上并未改变,一直处于一劣势的状态。由于这些预设,将文明总体加以对立比较的研究途径看来可以支持以下结论:即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劣势,其原因主要并非是受到当时国内的社会—政治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新近趋势所影响,而是由于中国文明(社会)的类似永久结构性特质长时期发展之结果,这些特质被定义为缺陷,是其有异于西方文明的典型特质之故。

- 4 关于中国的单调不变之见解并非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17世纪初,挑战“星空是固定不动”的说法的伽利略,使用了中国的隐喻——在当时,欧洲对中国才比较有一点认识,他指出不要因为距离遥远以及观测困难就有理由相信所观测的目标是不动的,这是很危险的。同世纪稍后,汉民族与满洲的斗争以及明朝灭亡时期的内乱均在西方被大肆报道,之后,担任清朝皇帝顾问的耶稣会士们也定期向西方的读者们报道其后中国发生的事件与政策。虽然部分的评论者表示怀疑,但耶稣会士的确报道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即中国的人口在18世纪时增加了两倍。而至18世纪仅剩最后1/4时,西方思想家则开始以新的观点去理解中国,此一观点认为欧洲在现世与宗教上均优于中国。亚当·斯密仍将中国理解为:业已久居世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亦即位居世上土地最肥沃、土地开垦程度最大、最勤奋、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然而,他认为自马可波罗以来,中国业已“长期静止”,并且于耕作、工业、人口方面改变很少。^{〔2〕} 我们举出斯密,并非因为他对于中国的评论非常新奇或是负面的——事实上,比起同时代人的同种言论,

〔1〕 戈比诺(Gobineau)及其追随者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就像是对于进步的渴望一样,视之为一种种族堕落的标志。参考 Blue, 1999。

〔2〕 Smith, 1937: 55.

斯密的言论属于温和的。我们举出斯密,是因为在下一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停滞论形成一种陈腔滥调,这一陈腔滥调乃欧洲社会理论发展者所使用,以发展出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或使用不同的名称,像斯密即称资本主义为商业社会)。虽然伽利略视宇宙为一动态系统的看法在当时正在被广泛接受着,然而西方思想家则正愈来愈视亚洲为一个整体,是一历史上停滞的地带,而中国乃其中的一部分。

对 19 世纪的西方思想家而言,无论其认为资本主义是完美的经济体系,抑或是达到完美体系的必要前置阶段,均认为资本主义是西方文明独特且有机地演变出来的。奇特地,正如王国斌在本卷所论证的,亚当·斯密式的商业社会模式是指许多规模不大,但它们之间或多或少大小相等的生产者,透过市场机制以达到其有效的收益。这一模式看来比较适合用来描绘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然而,由 18 世纪后期以来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间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一直深植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进步观阶段论当中。当资本主义被视为立于历史发展的顶点或是接近顶点,中国则被视为是一在历史发展上停滞的社会,很自然地即被放在历史发展的近底部位置。中国经济取得发展的惟一希望则是告别过去,并从西方学习。这一见解在浪漫主义、黑格尔派哲学、实证主义等之学术传统中愈来愈根深柢固,迄于 20 世纪的最初数十年。

由于以上之“资本主义”认知而产生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几乎所有有意将中国置于我们知识领域中的尝试都蕴含了一再重复先前的认知,亦即中国与资本主义是正好对立的一对组合。将这两种观念结合成一对,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的:资本主义对于将中国带回到“历史”发展的轨道上,厥功甚伟;中国方面则既无法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也无法顺服地从外输入资本主义,而声名狼藉。资本主义定下了其发展成功的条件,而中国不能达成;而另一方面,中国发展失败的例子不但使资本主义可以显示其文明之特殊属性,也呈现出其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型式之优越性。

这本书是我们集体的尝试,来思考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间的关系成分。我们并不直接处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发生的影响,亦不检验现时在东亚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兴趣是当资本主义已被视为型塑欧洲的社会及作为一世界体系时,它如何塑造关于中国的知识。我们的目的,在于找出以西方的资本关系与发展模式为普世基准的文化、意识形态潮流影响之下,在理解中国上所导入的扭曲。并希望由此能发展出对中国社会较充分的理解。为更进一步了解中国,我们必须开始不再将世界现代史书写为“欧洲的奇迹”,才能较不以欧洲中心论来理解这个世界。

进行这一质问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是:关于资本主义秩序在欧洲之出现,有何特殊之处?关于这一问题背后的假定,是在 14 至 16 世纪之间,部分的欧洲经历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政治变迁,增加了它在世界经济的行动能力。而这些变迁可被理解为构成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

第二个问题是:“欧洲资本主义转型”的观念如何影响欧洲人与亚洲人对中国的看法?这个问题的预设如下:在经历欧洲资本主义转型后,欧洲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关系的再定位对两地的知识造成深远的影响。欧洲人开始以不同的角度思考他们以及其他社会在世界的地位,这是受到了全球经济竞争环境改变的影响。

- 6 同样地,中国人对“中国的过去及一直以来的表现为何?”的认知亦因西方霸权的扩张而深受影响,这一影响在西方扩张开始进行的初期并不那么显著,但当西方霸权扩张在 20 世纪初大幅进展,中国发现自己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时,此一对认知的影响便趋深刻。

第三个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构成历史发展的普遍结局的观念业已歪曲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在此一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在分析中国史时超越这些歪曲?由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结构已并不需要与欧洲的国家、社会在转移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及转移后的情况相看齐,故为捕捉在欧亚大陆两端运作的不同动因,采取不同

的制度模式与历史变迁模式来进行分析也许有其必要。为超越既有的、主要植根于西方经验的历史分析范畴而再进行的对中国历史的周密探索,也许会使吾人对世界历史发展模式进行再思考,特别是对“西方的兴起”的经纬。

这本书的五章依以上的问题顺序进行。华勒斯坦呈现出一种辐凑式分析角度,发现欧洲资本主义的发生是由于欧亚大陆的潮流所导致,该潮流系在特殊情况下,在中古的“旧世界”中某一区域的贸易环境中产生。他的分析强有力地挑战了传统的解释,传统解释是将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归因于西方文明所蕴含的无时间性的“精神”,或是归诸于一个制度性的奇迹,而此奇迹是与其他在别处进行的事务毫无关系的。华勒斯坦将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视为对涉及所有旧世界在内的贸易体系所遭遇到的普遍危机的特殊反应。他的分析认为欧洲突破旧有囿限,发展成功资本主义秩序,是由于欧洲社会、经济上的种种限制发生罕见的崩溃的缘故,在其他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这些限制恰恰扮演了限制生产力与消费量成长的角色。他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起源定位于中世纪后期,这一分析对欧亚两洲长期结构性的相异有所启示。然而他对于何时及在哪些方面欧洲达到经济表现上优势地位的议题并未明言,留有探讨的空间。

在第二章,格力高利·布鲁将视野转向从16至20世纪早期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由于在远方若隐若现的中国,乃欧洲最重要的一个“他者”的社会,对中国的知识的累积,刺激了这些描述的产生。关于中国的知识包含了逐渐增加的资讯项目,以及与之结合,包覆在资讯之外的诠释之泥块。当西方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也包含中国——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压力时,诠释泥块也不断地随时被打散与重组。早期经由耶稣会士为媒介的接触使西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好的印象,不过西方从18世纪后期以后,其对中国的描述越趋轻蔑,时正当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力量获得惊人地发展与巩固的时期,同时,欧洲的新机械化产业对原料与

市场的需要促使资本主义更有系统地利用亚洲的经济潜力。殖民主义的巩固使得为非欧洲地域书写历史时或是描绘了一个品质上本来就是劣等的过去,或是认为其他地域虽然其封建的过去与欧洲情况类似,但却缺乏像欧洲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在这一知识的体制中,中国表现奇惨。中国多难的衰弱史事被作为欧洲成功现代化的划时代故事的一部分。

卜正民在第三章继续对中国进行分析,认为在历史书写上中国从属于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将考察点由欧洲人的叙述转移到亚洲知识分子所建构的历史书写。亚洲知识分子放弃对中国本身历史取向的分析途径,而采用欧洲所引导出的研究途径,这一途径所重视的是在中国资本主义没能发展出来。为了对抗将中国与日本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产生的政治动乱,许多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接受了西方人的中国观,此观点系基于相信由封建制度发展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来。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成长及其最终崩溃的论述书写,为吾人提供了一项保证,亦即中国最终将不经过资本主义,也可以超越其落后的状态,而达到具现代性的地步。在过去二十年间,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正逐渐在中国文化圈内扎根确立,上述使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论述很可能业已退潮降温,现在中国史学反较以前更重视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以连续性的传承体系取代超越性的说法。

- 在最后两章,白馥兰与王国斌进一步强力探讨质问汉学知识的西方基础,他们不诉诸过分简单化的有关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而直接考量中国史与欧洲史可以用何种方式来共同理解。白馥兰考察中国物质文明的长期发展趋势,以探索中国在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互相关联。她专注于中国南北区域优势的转移,此一转移发生于从 9 至 13 世纪的晚唐至宋代。这种长时期转移
- 8 她指的是中华帝国农产品组合的变迁——早期数百年中对中央朝廷收入举足轻重的是小麦、高粱及丝,但是由南方来的稻米与棉花从宋朝开始成为主要作物。接着她探讨性别角色在耕作及纺织过

程中的变化加深了精英分子的焦虑感,而且随着农村经济在稍后的几百年中愈来愈商品化的情形而使得儒教体制下的国家担心其道德的失控。

王国斌将我们的关注移至中国内部经济转变的动力,以及中国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转变中的关系。从晚清时开始追寻这一问题的两方面线索,追至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将讨论带回主要问题:即寻找足够的经济上、历史撰述学上的理论工具,用以解释在中国宋代即已经明显,特别是16世纪以后更为显著的商业迅速发展。王国斌采取亚当·斯密式的商业社会模型作为研究取向:在此商业社会中许多各种各样的小生产者在互相竞争。他指出晚近的研究文献在描述区域间劳力与商品的流动毫无阻碍时是颇有问题的,反而他发现亚当·斯密关于商业社会的模型不仅适合于分析近代初期的欧洲市场,而且适合于分析帝国晚期与民国时期。然而,在总体经济学层面上,中国人对于资本的集中、财货的分配以及生计的维持上所作的选择均与欧洲人的选择不同,故最终导致资本的形成与社会的特色亦不相同。所以,这些选择亦使今日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有了不同的情形。

本卷呈现出的挑战并非仅止于想使研究中国的史学家们跳脱欧洲中心论,达此目的本身就不简单;更有进者,本书亦欲使以欧洲历史经验为研究预设的社会学者承认:关于中国的知识在构建理论时所造成的挑战,并使社会学者借此重新思考世界的现代史。重点在于以建立一理论架构的方式来认真严肃地分析中国,这一理论架构应能包含中国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境,并非仅集中于中国历史中某些可加强或否定某些现存西方(或其他学术领域)社会理论的层面,而应是将中国的情况视为一重大事例,必须完整地成为一种算得上充分够用的理论所解释清楚才可。

自从中国于197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改革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联正不断地深化;而中国以外的华人社群,亦借着不断增进的成绩,而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以上事态 9